

CNR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FUSION AND OPPORTUNITY
OF CHINESE ECONOMY

破局：中国经济的 危与机

李克◎著

危机并重，中国经济如何打破迷局？
深陷重围，转型升级如何实现？

联袂
推荐

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王忠明（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杨春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副总监）

人民出版社

CNR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F12
337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FUSION AND OPPORTUNITY
OF CHINESE ECONOMY

破局：中国经济的 危与机

李克◎著



北航

C1704181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武丛伟
装帧设计:石笑梦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局:中国经济的危与机/李克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01-012706-4

I. ①破…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4427号

破局:中国经济的危与机

PO JU ZHONGGUO JINGJI DE WEI YU JI

李 克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10千字

ISBN 978-7-01-012706-4 定价:39.8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前 言 “中国梦”离我们有多远? /001

I

中国经济为什么这样纠结?

- 1 中国概念股的暴跌意味着什么? /012
- 2 中国经济增速很快,但软件配套和人才培养没跟上 /019
- 3 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尴尬? /021
- 4 不看好中国股市国际板的前景 /026
- 5 高能耗牵制了中国经济的成长 /028
- 6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要学习的方面还很多 /034
- 7 中国企业国际化不只需要苦练内功 /037
- 8 现在说经济实现软着陆还为时尚早 /039
- 9 要把小微企业当作弱势群体来呵护 /047
- 10 中国企业应加强行业整合能力 /050
- 11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需对多元文化宽容理解 /054
- 12 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提高核心竞争力 /057
- 13 提升软实力及核心竞争力,助力中国经济 /060
- 14 期待量化宽松政策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不可取 /064

- 15 软件、通讯公司需看重中长期发展 / 067
- 16 中国提升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质量提升 / 070
- 17 中国经济和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 074
- 18 城镇化 $\neq$ 城市化，城镇化建设不能走入误区 / 076
- 19 海外上市不能把国外制度当儿戏 / 080
- 20 中国企业面临“接班”难题 / 083
- 21 “国内垄断、国外扩张”的三星模式未必适合中国企业 / 086
- 22 中国企业应具备“瘦身”意识 / 089
- 23 产能过剩、过度杠杆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拦路虎” / 091
- 24 新型城镇化需要从根本上消除等级差异 / 099
- 25 产业希望长远发展关键要提升核心竞争力 / 101
- 26 利率市场化难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 104

II

困扰中的当今世界经济

- 1 “财政悬崖”加剧美国经济下滑担忧 / 108
- 2 日本经济人士担忧日企不敌中韩：再生之路布满荆棘 / 110
- 3 美联储推出 QE3 对中国负面影响大应及早应对 / 114
- 4 东亚应保持积极冷静应对欧洲危机转移 / 117
- 5 中国经济下滑受自身和欧美市场负面影响 / 119
- 6 韩国三星遭遇市场定位的“消费陷阱” / 121
- 7 全球化为日本垂直行业整合带来大挑战 / 124
- 8 日企将逐步从垂直模式向水平整合转移 / 126
- 9 日本拟征消费税解决债务问题：能否稳定实现有待观察 / 128

- 10 中国出手救欧洲是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 130
- 11 奥林巴斯丑闻暴露日本企业封闭保守式经营弊端 / 132
- 12 TPP 计划扩容将有益于美国出口 / 134

III

经济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

- 1 科技界领袖的成长 / 142
- 2 菲律宾吸引日本企业落户的启示 / 145
- 3 日本 36%有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希望走出国门 / 147
- 4 日本企业对中国企业注资并购态度正在转变 / 150
- 5 日本中小企业如何解决融资难? / 153
- 6 中日韩三国合作前景广阔 / 156
- 7 人民币直接兑换日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158
- 8 日本便利店服务模式值得中国零售业借鉴 / 161
- 9 东亚一体化进程对中国非常重要 / 164
- 10 中国企业需了解国际规则,避免成美国靶子 / 173
- 11 对 2013 年全球经济形势,保持谨慎乐观 / 177
- 12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向好 / 180
- 13 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刺激国内消费是唯一出路 / 183
- 14 加强监管“影子银行”和表外业务 / 185
- 15 多重因素致日经指数大幅下挫 / 193
- 16 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纠结困扰 / 195
- 17 中国应参考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中美抗衡提法搞笑 / 202
- 18 莫让日本中小企业远离中国 / 207

IV

中国经济的未来出路

- 1 投资日本中小企业的新思路 / 212
 - 2 中国应抓住外资投资机会 / 215
 - 3 中国企业全球化要密切关注产业安全 / 218
 - 4 中国应学习经济成长期以后的日本 / 220
 - 5 并购企业需多沟通交流, 适应新型发展模式 / 223
 - 6 日本政府投资中国国债, 欲求与中国更深层次合作 / 225
 - 7 把握中日邦交 40 周年契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 227
 - 8 中日未来应在能源技术方面加强合作 / 230
 - 9 企业强强联合已成趋势 / 233
 - 10 海外并购存隐患: 日本企业“走出去”战略值得借鉴 / 235
 - 11 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刺激国内消费是唯一出路 / 237
 - 12 劳动力成本上升, 代加工企业需加快转型升级 / 244
 - 13 国际黄金价格暴跌, 因作为金融衍生品反复担保 / 250
 - 14 全球经济增长受阻, 新兴经济体仍有增长势头 / 253
 - 15 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 / 256
 - 16 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 264
 - 17 宏观政策日本可为鉴 / 277
 - 18 “腾笼换鸟”关键是培育“自己的鸟” / 280
 - 19 转型升级: 中国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什么 / 286
 - 20 世界工厂模式已经走到末路 / 294
- 后 记 / 296

前言

“中国梦”离我们有多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其中虽然不乏风风雨雨，但是时至今日，其成就还是为世人所肯定与称道的。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声誉也在不断攀升，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个将“世界工厂”作为发展坐标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成为各级政府主导性的工作思路。

作为一个曾经在贫苦、羸弱中苦苦挣扎了上百年的国家，其赶超与富裕的理想和冲动是不难理解的，并且这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几代人的追求和梦想。从晚清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君主立宪的尝试；到五四时期对“德先生”、“赛先生”的科学民主的渴望；直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孜孜追求，其中都折射出中国对民族复兴与强盛的执着。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又一次身处绝境的奋力一搏。国门的打开带给中国的不仅是先进的技术资金，更为深刻的是让国人看到世界，感受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环境与商业文化。比较而言，技术的引进与模仿是相对容易的，而制度的学习与模仿却是非常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持续地进入中国，不但直接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国际贸易领域的极度活跃。据WTO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

量 30 年增长 105 倍，2009 年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0 年中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 9.7%，并且很快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根据 IMF 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 1978 年的 1.8%（世界第 10 位）上升到 2007 年的 6%，更于 2012 年达到约 10%（世界第 2 位）。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经济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6.5%、2001 年的 11.5% 提高到 2007 年的 23.7% 和 2010 年的约 40%。如果按照中国年均 7% 到 8% 的经济增速和人民币年均升值 5% 的速度，美国则按照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 1.7%，再考虑到美元在未来将出现的长期贬值趋势，根据这些假设条件测算，中国的名义 GDP 可在 2015 年内达到美国经济 80% 左右的规模，人均 GDP 将接近 1 万美元的水平，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到 2020 年则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国人振奋，这似乎也是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有力的注脚。各种形式的中国招商引资团穿梭于世界各地，构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

但问题是，“世界工厂”就是中国的明智选择吗？

当我们透过 GDP、外贸额 (Trade Volume) 这些过于宏观，有时也带有误导性的指标，冷静地考核“世界工厂”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民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和福祉时，结果可能就不那么令人振奋了。

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含金量到底几何？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专家 John Benedetto 在 2012 年 7 月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详细论证了一个既显而易见又容易被忽视的观点：一国与世界的总贸易差额（即官方统计的贸易差额）等于其附加值贸易差额。由于一国与世界的附加值贸易差额是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双边附加值贸易差额的加总，那么如果基于附加值基础上的中美贸易差额要远低于现有官方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这部分缩水的贸易差额必然导致中国与其他国

家附加值贸易差额高于官方统计数据。

John Benedetto 认为，如果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差额占其进口的比重很大，那么中国就必然出口了大量的附加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绝不仅仅是产业链末端的世界工厂！在这一约束下考察我国附加值贸易差额占进口的比重，我们发现该比值由 1990 年的 16% 上升为 2007 年的 28%，金融危机以后，该比重又有所回调。从加工贸易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工贸易顺差占加工贸易进口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48.7% 上升为 2011 年的 82.1%，2012 年略降到 77.8%，但依然位于较高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随着加工贸易企业逐步推进转型升级，我国的出口附加值确实有所上升，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出口附加值的上升既有数量扩张的因素，也有质量提升的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 Robert Koopman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所占份额由入世前的 50% 左右上升为 2007 年的 60%。在高科技部门，如电信设备、电子计算机、测量仪器等，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可能不足 30%，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国内附加值率是不断上升的，部分重化资金密集型工业（如汽车、工业机械等）的出口附加值率提升幅度较大。

因此，近些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国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很多外资企业将关联配套产业转移到中国，本地化采购占比提高，其中也不乏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事实上，近几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也可以部分反映出这一变化。虽然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出口的附加值也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附加值，但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步走弱，我国的外贸企业也在积极寻求转型升级。

从对外贸易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正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世界工厂”这顶帽子还会戴多久，谁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绝对无法长久地依靠“世界工厂”模式。

“世界工厂”的主要表现，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OEM）的发展模式。如果作为一种短期性的企业策略或者阶段性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是完全可取的和正确的，因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而要在工艺、产品、技术等方面达到国际水准，就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就是一种短期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世界固然是在走向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的到来；相反，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却变得更为剧烈与直接。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自主的、可持续自生发展和创新的国内经济系统，在今后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将会越来越处于一种被动、脆弱的尴尬状态。

建造“世界工厂”固然对GDP的增长具有简单、快捷的功效，而且也可以解决当前中国就业和资金等方面的燃眉之急；可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配套的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是不能够被跳跃的。即使目前这种“世界工厂”模式可以暂时缓解中国经济中的发展矛盾，但是也有可能由于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而引发更深远和长期的隐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后发劣势”。就算是日本这样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近十几年来的经济持续低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制度改革的滞后所造成的。因而，“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我们姑且不论它对环境的大量破坏、对资源的疯狂消耗，以及所对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是作为经济发展模式本身，这种当代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蕴含的危机和矛盾也应该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对待。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工厂”

的这种“拿来主义”的发展模式忽略了民族工业与品牌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开发与提升，对中国的长期持续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隐患和不确定性。同时，“世界工厂”也无法让普通民众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我们暂且不论招商引资与代工、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也不必深究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仅从模式本身所导致的结果，就能发现老百姓的生活收入并没有得到与 GDP 增长同比例的提高。

然而，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招商引资和代工、加工贸易确实是提高 GDP 的快速手段，也可以称作“GDP 情结”、“增长速度情结”。如果能引来几个大型外国企业，GDP 就能够马上提升，紧接着地方的各项经济指标、贸易额等数据也会提升。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招商引资是非常有效、快捷的一个方式，特别是 GDP 增长情况也是地方官员的政绩的主要评估指标之一。20 世纪末，招商引资曾经达到白热化，当时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就是中国的招商引资团。尽管近年来这种招商引资团的规模正在缩小，但仍然是各地政府的发展工作重点。

因此，如果我们把“世界工厂”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和隐患。因为“世界工厂”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在此过程中逐步丧失我们的自主研发能力、对技术和行业标准的话语权、对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更谈不上对世界经济的领导力了，最后沦落到全中国人为外国人“打工”的境地。

因此，在我们追寻中国梦的今天，应该明确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中国梦”；国富民不富不是中国梦。当然，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并不是要大规模的私有化或瓜分国有资产，改变不合理的财富结构应该首先确立对国有资产和私有财产都加以保障的原则。经过三十多年经济连续高速增长，2010 年我国 GDP 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 2。然而，中国同期人均收入全球排名只有第 120 多位，远远落后于国家总量

财富排名。此外，中国还存在财政收入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以及国有资产膨胀更快等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从 2005 到 2012 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复合增速 13%，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复合增速高达 21.9%。截至 2011 年底，全国非金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 85.37 万亿元，所有者权益 29.17 万亿元，分别是 2003 年的 4.3 倍和 3.5 倍。经济发展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当政府占有的公有财富扩张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居民的消费和私人投资被挤占之时，其财富增长必然会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就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的效率而言，私人部门投资除了在快速形成规模经济上可能逊于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之外，大部分情况下私人企业运作的效率都高于国有企业。从财富创造的终极目标来讲，大部分公民的消费需求毕竟都是通过个人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所以社会财富也应该更多地向私人部门倾斜。如同政府和公共管理机构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为人民服务，公有财富和国有资产的关系也应该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如果公有财富存在的意义不是为公民创造福利，甚至会从本质上沦为官僚阶层的私产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

当然，要实现人民的富裕，并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或瓜分国有资产，因为任何一个阶段不尊重既定产权关系，都会为下一个阶段更不尊重原有产权留下隐患，最终陷入“产权改革陷阱”。改变不合理的财富结构，应该首先确立资产和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从增量入手，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从要素供给贡献和要素边际报酬出发，尽快启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刺激民营经济大发展。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 5 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

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确保国家财富的长期增长。在确保财富总量和民营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供给端出发，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 5 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报酬，让市场完成收入分配。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这些收入分配原则，可以成为我们制定新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参考思路。

近些年的世界也在急速的动荡和转型过程中。既有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波及全球的一轮轮地区性危机的持续冲击；更多的变化却是由数字技术、机器人技术所带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推动着高中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以及国际产业模式的重新定位、产业和贸易标准的重新修正、新的游戏规则的不断制定。遗憾的是，很多国人却是身在其中，而浑然不知！

事实上，联合国于 2008 年已经修改了 1993 年制定的 GDP 计算标准，目前正敦促成员国加以采用。美国于 2013 年采用新标准，日本则将于 2016 年开始采用新标准。中国尚未确定引入新标准的时间，目前的 GDP 计算标准是联合国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 (SNA)。这类似于民营企业制作财务报表时的会计准则，是衡量一国经济情况的指标。世界各国以相同标准计算 GDP，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在国际标准修改后，此前不包含在内的企业的研发费用等将计算在内。日本 GDP 在 2016 年采用新标准时最多有望被推高 3% 以上。将对日本 GDP 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研发费用的纳入。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显示，如果将研发费用纳入 GDP，日本的名义 GDP 有望被推高 3.1% ~ 3.4%。被推高的金额将达到约 15 万亿日元（约合 8897 亿元人民币），超过越南的 GDP（2012 年约为 8185 亿元人民币）。按照新标准，在研发费用以外的领域也将扩大经济价值的认定范围。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已开始将战斗机和坦克等兵器计算在内。而美国正打算将电影原作和长寿电视节目等娱乐作品的价值计算在内。

当然，全球化也是过去 30 年的一大经济主题。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全球化不仅影响了商业，也在整体上对世界大部分地区产生影响。推动全球化的有技术方面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也有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主要是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人口流动。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特别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它重塑了商业活动，创造了创新、生产、营销和分配的一体化链条。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生产转移到了低工资经济体，“赢家通吃”的市场加剧了不公平，破坏稳定的投机活动引发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因而，金融领域正在重新制定监管规则。后危机时代的监管新动向有可能使全球银行业进入“割据”状态。由于深陷全球和欧元区金融危机的高收入国家失业率激增，就连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也放缓了，尽管没有出现倒退。有人可能会担忧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会突然崩溃，这让人联想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场景。然而，目前的形势还没有那么危急。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两股强大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方面，市场经济跨越国界寻求机遇。大部分制造业、金融业以及任何可以数字化的服务业都是极容易进入贸易的。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监管框架以及人的忠诚都是以国家甚至地方为界的。对这种来之不易的平衡的破坏，损害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公正性和效率的信任。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后，是市场乐观主义的全盛时期，这种乐观主义最初由美国和英国释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推动。从那之后，金融危机就一直在摧毁这种无忧无虑的信心。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很多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市场的威力防备起来。而现在高收入国家的危机也带来了同样的结果。然而，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仍然强大，包括：英语逐渐成为世界语言；寻求更好教育和就业的人们的跨国界流动；管理跨国

公司并生活在全球中心城市的全球经济和商业精英的崛起；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的跨境传播。然而，阻碍全球化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人们希望更加严格地监管市场，减少不公平，提高个人经济安全，所有这些愿望都非常强烈。未来，人们会寻求全球化和监管的一种复杂平衡，以期望更加积极地、有效地激发出全球化的有利功效，同时兼顾公平因素、国别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等。

本书将会围绕以上两个领域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期待可以为读者朋友们解答困惑、启发思路。其中的不少问题，之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李克财经视角”专栏中和大家交流过，反响很好。在这里重新梳理以后，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整理、诠释和解读，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加完整、清晰的感觉。

